



城市 · 市场 · 海运

樊 铎 著

學苑出版社

城市 · 市场 · 海运

樊 铎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市场·海运/樊铎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077-3193-4

I. 城…II. 樊…III. ①城市-商业地理-文集②海上运输-运输经济-文集VI. F731-53 F550.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84806号

责任编辑: 韩继忠

封面设计: 徐徐书装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永清县金鑫印制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87 × 960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500千字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印 数: 0001—1000册

定 价: 29.00元

序

韩茂莉

这是一本樊铨的学术论文集。

樊铨17岁考入北京大学，19岁开始撰写学术论文，收入文集的分别为他本科以及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阶段发表或撰写的文章，随着他所学专业从经济地理向历史地理、明史转变，他的关注点也在不断变化。最初樊铨的研究偏重于历史商业地理，收入文集的《民国年间北京城庙市与城市市场结构》、《民国时期陕北高原与渭河谷地过渡地带商业社会初探——陕西同官县的个案研究》以及《明清北京市场考》三篇文章均属于这一时期撰写的文章。樊铨有着良好的经济地理学基础与敏锐的分析能力，无论地理学的基本理论还是施坚雅等西方学者就中国明清时期商业活动地域特征作出的研究，他都本着科学精神进行了诠释，与此同时他也试图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梳理出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商业行为的空间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研究框架。事实上这三篇文章虽属樊铨构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但基本还处于对资料的分析论证阶段，无论以北京城市市场，还是以陕西同官县为研究对象，他希望看到地理环境、社会基础与商业活动空间过程的对应关系，他选取庙市等定期市以及常日市等指标作为甄别地区商业繁荣程度的重要依据，正是利用这些依据他获得了对于地区商业交易空间特征的初步认识。按照樊铨最初的设想，在更多样本的基础上，他将对明清以来500年内中国商业活动的空间过程作出全面研究以及理论性的探讨。《民国年间北京城庙市与

城市市场结构》发表于2001年，撰写于1998年，那时樊铎刚刚进入大学三年级。柴彦威老师任教的“人文地理”课需要提交一篇期中作业，樊铎和我商量好选题，不久即形成文章。文章最初投送到《地理研究》，几个月后即收到用稿通知，记得当时柴老师十分高兴，对大三的同学获得如此成就大加赞扬。有些事我最初就想到了，考虑到樊铎还在大三阶段，作者身份在稿件上没有出现，当编辑部电话中询问樊铎基本情况与通讯方式时，人太年轻的事实再也瞒不住了。不出所料，果然编辑部有些后悔，“你还年轻，我们这里教授、博士急等发表的稿子多着呢”。后来这篇文章改投《经济地理》，还好同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发表时已是2001年。《民国时期陕北高原与渭河谷地过渡地带商业社会初探——陕西同官县的个案研究》与《明清北京市场考》分别是樊铎的本科与硕士毕业论文，《民国时期陕北高原与渭河谷地过渡地带商业社会初探——陕西同官县的个案研究》通过对同官县市镇商业和集会商业的情况的分析，指出在同官县这样一个地形比较复杂、位置比较偏远的地区，商业社会既有其现代化的一面，又有其传统的一面。首先，各镇多有商店，现代化的商品经济交易形式已经出现，而且由于不同行业的不均匀分布，在县域内部各镇已经有了不同等级中心地的出现。其次，同官县已经具有了专业化生产的市镇，专业化生产代表外向型经济的需求，同官县商业社会已经具有了相当强的开放性。由于同官县本地对百货、粮食、家畜等商品的需求，以及关中地区对于同官专业化生产的煤炭、瓷器等产品需求，使同官县已经被纳入关中地区市场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同官县域内部存在的集会商业仍然具有传统的特点，定期开放的集会仍然从无形中圈定人们生活的活动范围，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同时，定期市这种传统的商业方式又结合同官县外向型的经济，把同官县的商业活动与外界紧密联系起来。从外界输入的各种产品和本地要输出的产品，多在集会上进行交易，基层市场社区和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民国时期陕北高原与渭河谷地过渡地带商业社会初探——陕西同官县的个案研究》一文形成的结论对于认识20世纪初期黄土高原边缘地带商业活动空间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明清北京市场考》则更多着眼于对基本事实的考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明清北京城商业与市场在元代基础上发展起来，且在发展过程中伴随城墙南移，明代商业中心依次从钟鼓楼一带移至

地安门，再由地安门移至棋盘街，同时在城内西四、灯市等处形成固定市场，这些固定市场的位置由明至清虽然略有变动，但在整体上保持着相对接近的位置。这篇文章澄清了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明代北京城商业以市集为重，按期而聚的观点，指出固定市场在棋盘街、东西江米巷、前门外、西四、灯市、地安门外、东西单、菜市口、崇文门外等地均形成固定市场，此外东四、新街口、北新桥、东安门、交道口等地以及朝阳、安定、德胜、阜成诸门外关厢也有市场与店铺存在。基本形成以棋盘街——前门“朝前市”为中心，东有灯市，西有西市，加上上述市场的布局规模。文章肯定了明代庙市以及其它集市，作为固定商业市场的补充形式，以定期市形式所发挥的重要商业职能作用。并指出明代北京庙市中城隍庙市规模最大，此外土地庙、药王庙、东岳庙主办的庙市也占有重要地位。文章同时指出清代前期内城商业市场一度衰落，商业贸易主要依靠庙会、集市以及摊商、小贩进行，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清代将内城划为八旗营地相关。内城商业市场重新恢复大概在道光、咸丰以后，这时满汉分居制逐渐松弛，伴随内城店铺日益增加，固定商业网逐渐增加，终于形成正阳门街、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以及外城的菜市口、花市的市场布局，加上庙市与专业集市共同构成北京城的市场网络。按照樊铎最初的设想，《明清北京市场考》只是明清北京商业地理研究的第一步，以后的工作将在这一基础上侧重于商业社会行为与理论探讨。

进入博士研究生阶段，樊铎师从香港中文大学朱鸿林教授，研究方向转向明史。文集中《海洋活动与明太祖时代》、《论明人宋礼历史地位的取得》、《论明人对海运的思考与认识——以海运图为主要线索的考察》、《明初南北转运重建的真相：永乐十三年停罢海运考》四篇文章属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进入博士研究生阶段樊铎学术思维日臻成熟，在他自己的一段陈述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学术研究虽然首要把握学术主流的来历，但不应局限于成说的格局，不论是对前人研究还是历史文献，都当抱着‘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方能寻找到研究的新路向。”正是这样一种对前人、对自己的清醒认识，樊铎从事研究的着眼点与方法都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研究历史靠的不是文献中的只言片语，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也不都是史传中所明言出来的。因此，不仅阅读文献的内容，还应时刻留心

它们的编纂背景和刊刻流传过程。传记、文集、方志、笔记、正史、史着，甚至类编材料都表达了不同历史写作者对时代的观察，明析文献生成和所记史事之间的关系是我对待史料的基本态度。我关怀的是隐藏在历史书写之后的历史潜流。”关注“隐藏在历史书写之后的历史潜流”这一理念的提出，意味着此时的樊铨早已不仅是追随师长身后的学生，他清楚地意识到“史传中所明言出来的”与真正历史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在于他在冷静而独立的思考中确定了自己的前行之路。“我关注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因为一个时代的政治过程和思想趋向的变化往往互相影响，它们构成了倾听那个时代的主音。而任何政治事件的发生必有相应的地理状况伴随，同时，地理观念的变化也能够反映时代的思想变化，所以，我特别关注历史地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每一项研究都作到‘生动’，即是说，每一个论述都要建立在理清‘时’、‘地’、‘人情’这些要素的基础上。因此，在我的研究中，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是学术关怀的‘体’，历史地理是表达关怀的‘用’。我希望以时、地、人情之间的关系来把握历史的真相，为普遍知识领域提供新知新见”。这本文集中四篇以思想史为基点，研究明代海运的文章就是樊铨在这一目标之下形成的研究成果。《海洋活动与明太祖时代》重点解析了明太祖朱元璋对海洋活动的态度和海洋策略的应用，并通过明太祖态度变化和政策调整中，勾画出隐藏在背后的诸多深层原因。《论明人宋礼历史地位的确立》一文，樊铨以宋礼历史地位变化过程为线索，论证了明代中后期漕运形势与政治风气的潜移默化，并从中折射出更宏大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论明人对海运的思考与认识——以海运图为主要线索的考察》透过对历史地图细节的变化，探究了图像背后潜藏的历史事件，并由此扩展开来，勾勒出整个时代政治文化和思想趋向的特征。《明初南北转运重建的真相：永乐十三年停罢海运考》研究要点在于，明朝永乐年间，里河漕运取代长距离海运制度，成为国家极重要的经济活动。对于这场重要的南北转运重建事件，除了在史书中反复提到的宏观政治经济背景原因之外，是否还有沉淀在历史深处的民间利益诉求？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解析了明代围绕运河建设而形成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结果表明，在明代以运河为核心的经济地理格局中，运河不仅控扼着国家经济的命脉，更促进或者限制了运河沿线甚至更广大区

域的地方经济发展，因此地方的利益诉求也逐渐影响了国家政治决策。这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出发点，在明确了这种潜在因素之后，重新观察明代的海运与河运之争时，透过历史的表象，许多更深层次的原因也随之浮现出来。

最后需要述及的是《现实与想象之间：元明文学中的包公与民间的法律认知——以“陈州粳米”为核心的研究》，这篇文章以包公“陈州粳米”的故事为案例，解析了元明文学中包公形象和诉讼程序的转变，并探讨这些转变所赖以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依据。文中强调的“金牌”是法律程序中一个看似矛盾的存在——拥有金牌者可以依托其为非作歹，但包公却又终于因金牌而获得断案的合法性。在对这一矛盾的解析过程中，作者并未停留在纯粹的法律史考证阶段，而是选取了独特的法律文化视角，对文学虚构与现实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并描述出在文学作品形成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民众对国家法律的想象。

《西涯怀古道东阳》和《南宫犹记上皇事》是两篇历史文化随笔，不是很深入的专题学术研究，却以诗化的笔触，将淡淡的忧伤融入对历史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叙述中。

就学术资历而言，樊铎无疑还属于刚刚结束学生时代的年轻一辈，但若抛开年资，仅论文章的学术水准，天分、悟性与勤奋的努力使他的研究不仅居于同辈之前列，而且已展现出超越前辈师长之势。按照樊铎的计划，还会做更多的研究，写出更多优秀的文章，但一切都在2008年4月4日这一天戛然而止。这本论文集，记录了樊铎的全部学术生涯。

2008年8月2日于北京大学新地学楼

目 录

序

民国年间北京城庙市与城市市场结构 /1

民国时期陕北高原与渭河谷地过渡地带商业社会初探

——陕西同官县的个案研究 /11

一、同官县概况 /12

二、市镇商业 /14

三、集会商业 /24

四、结论——过渡地带过渡型的商业 /29

明清北京市场考 /31

一、研究背景 /31

二、明代以前北京的商业概述 /35

三、明代北京的市场 /40

四、清代北京的市场 /60

五、结语 /94

明太祖对海洋的态度及洪武时期的海运 /101

一、前言 /101

二、明太祖对海运的态度和开国征战时期对海洋交通的运用 /103

三、海运对治平天下的意义 /108

四、明太祖在治国中对海洋活动的态度 /112

五、洪武中期海洋政策的转变和洪武三十一年之诏停海运 /119

六、结语 /127

论明人宋礼历史地位的确立 /133

论明人对海运的思考与认识

——以海运图为主要线索的考察 /157

一、前言 /157

二、《广舆图》及其所反映的海运信息 /162

三、《广舆图》的版本流传及受其影响的地图中的海运信息 /170

四、通过其他途径传播的海运知识 /181

五、结论：双重分叉——在现实与思考中的明代海运 /186

明初南北转运重建的真相：永乐十三年停罢海运考 /195

一、前言 /195

二、北方开发和南北物资转运之间紧张的产生和明成祖的应对 /197

三、南北转运的重建与海运的停罢 /202

四、结语 /210

现实与想象之间：元明文学中的包公与民间的法律认知

——以“陈州粳米”为核心的研究 /213

一、陈州粳米的故事 /215

二、元明金牌之来历与象征意义 /217

三、明代的老人制度与陈州粳米故事情节的改变 /224

四、结论：从元到明——俗文学对现实元素的选择性吸收 与民众的法律想象 /227

西涯怀古道东阳 /229

南宫犹记上皇事 /235

后记 /241

民国年间北京城庙市与 城市市场结构

(原发于《经济地理》第21卷第1期, 2001年1月)

庙市是伴随寺院或宫观的宗教活动而出现的商品交易场所, 它的起源很早, 有人认为从《周礼·考工记》中“左祖右社, 前朝后市”的城市内部布局的形制中已经可以看出庙市的端倪。从历史文献的进一步记载来看, 唐宋时期庙市的商业职能才逐渐显示出来, 这在《东京梦华录》等文献中都有一定的记载。

庙市的形成与寺院或宫观的规模及宗教影响有关, 大凡建筑规模与宗教影响大的寺院或宫观, 在举办庙会的同时, 往往有与之相伴的商业活动。一般各个庙观举办庙会的时间是确定的, 依托于庙会的庙市也就具有定期市的性质了。由于庙市具有定期的特点, 大型庙市在城市的市场结构中就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以固定的时间、场所和适应市民生活所需要的商品成为城市市场结构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北京是中国具有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古都, 依据庙会而出现的庙市也同样有很长的历史, 这些庙市始终在北京城市市场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对北京历史时期庙会商业的研究, 对于理解北京历史和现代的市场结构形成和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庙市是与庙会相伴而行的现象，但庙会的含义比庙市广的多。就民国年间而言，北京的庙会就有4种含义^①：①每逢祭日，信仰佛道之民，进入庙宇进香敬神，此种庙会以宗教仪式为中心；②承“仲春之月大会男女”的遗风，士女借佛游春，此种庙会以游乐为中心，宗教与商业活动不过附属；③于庙宇中设定期市集，交易百货；④已经脱离了庙宇范围的定期市集，仅只是沿用庙会的名称。后两种庙会形式都是以市易为中心，第三种旧时便称为“庙市”，第四种其实已经与一般的定期市集无异，但由于其源于寺庙，开市仍以庙宇为名，所以本文亦以庙市称之。

1. 民国年间北京庙市分布概况

民国建立以来，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加之西方文化思想的传入和城市交通结构的改变，北京庙会中郊外借佛游春的庙会多趋冷落，郊区和城内庙会的宗教活动也多衰没。而庙市却有兴有衰，逐渐形成了以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土地庙和花市集五大庙市为主的全城性庙市体系。

1) 隆福寺

隆福寺在东四隆福寺街，据记载为明景泰三年建^②，俗称东西庙中的“东庙”，记载自正月起每月九十日开庙^③。建寺之初为皇家日常进香的大会，明末清初，受城市建设和灯市迁移的影响，东四商业区更加繁荣，隆福寺庙会才逐步转为商业性的集会。雍正年间，曾对隆福寺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大修，并改为雍正故居雍和宫的下院。经此次重修之后，庙内香火愈盛，庙会的规模也随之扩大，被称为“诸市之冠”^④，并由此发展出了繁华的隆福寺商业街。民国以后，因为东城的外人侨居很多，所以商业日盛，隆福寺比以前更加繁盛了，开庙日期也由从前的二日增至四日。

2) 护国寺

护国寺位于西四护国寺街，是元代兴建的庙宇，“元曰西崇国寺”，“明宣德年

① 北平民国学院：《北平庙会调查》，北京：民国26年5月印行，第1—71页。

②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五，引《明景帝实录》。

③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④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五，引《大清一统志》。

赐大隆善寺，成化间赐名大隆善护国寺”^①，记载自正月起，每逢七、八日开庙^②。清代由于西城为满族与旗人聚居之所，这些人都属于社会上层，日用所需多取于庙会，所以清代时护国寺庙会相当繁华，与隆福寺庙会合称东西庙。《清代北京竹枝词》有“东西两庙最繁华，不数琳琅翡翠家。”之句，戴璐也称“庙市唯东城隆福，西城护国二寺，百货具陈，色迷五色，王公亦复步行评玩，鲍西冈有句云：‘三市金银气，五侯车马尘。’足括庙市之胜。”^③民国建立以后，护国寺庙市渐有衰落的迹象，主要是由于满族及旗人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所以护国寺庙市因之遂衰。但护国寺庙市以其悠久的历史 and 规模之盛仍然在北京城的经济中占重要地位。

3) 白塔寺

白塔寺位于阜成门内大街路北，建于辽寿昌二年^④，是北京民国年间存在而又确知的最早的庙宇。悠久的历史使它的庙市具有较为强大的传统引力，所以民国年间，白塔寺庙市仍然比较兴旺。

4) 花市集

花市集位于崇文门外花市大街，是由火神庙庙会发展而出的。花市火神庙为明代所建，记载“自正月起，凡初四、十四、二十四日有市。”^⑤后来花市集移集庙外大街，与庙宇全无了关系。

5) 土地庙

土地庙在宣武门外土地庙斜街长椿寺南，是为金代庙宇，元代时名老君堂。记载“自正月起，凡初三、十三、二十三日有庙市。”^⑥《北京指南》载土地庙“……阴历每月之三日，必有庙市。清光绪丙午以后，则每月之二日亦为庙期，游人极多。”可见清末以来土地庙庙会有越来越兴旺的趋势。

据民国26年北平民国学院印行的《北平庙会调查》，北京在1937年总共有36个庙市。除去前述五大庙市在内城外，内城还有吕祖阁、都城隍庙、东药王庙、雍

①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三。

②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又见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三。

③ [清]戴璐：《藤阴杂记》卷四。

④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二，引《春明梦余录》。

⑤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⑥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和宫、吕祖观和北药王庙等6个庙市；外城有吕祖祠、海王村公园、太阳宫、桃宫、卧佛寺、灶君庙、善果寺、南药王庙和江南城隍庙等9个庙市；郊区的庙会有东岳庙、九天宫、十八狱、铁塔寺、东顶、财神庙、白云观、大钟寺、妙峰山、西顶、关帝庙、南顶、中顶、黄寺、黑寺和北顶等16个。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七年新建的海王村公园庙市，它是将东城灯市口的灯市与旧时的琉璃厂甸、土地祠、吕公祠合为一处形成的，后来这个庙会没有衰没即与此有关，此外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改用公历以后，兼用旧历，又增加一次十日的会期（旧历正月初一至十五以外，增加公历一月一至十日）。海王村公园庙市自民国新建以来有了兴盛发展的趋势，而海王村公园也成为民国年间北京庙市中除了五大庙市以外较为重要的一个（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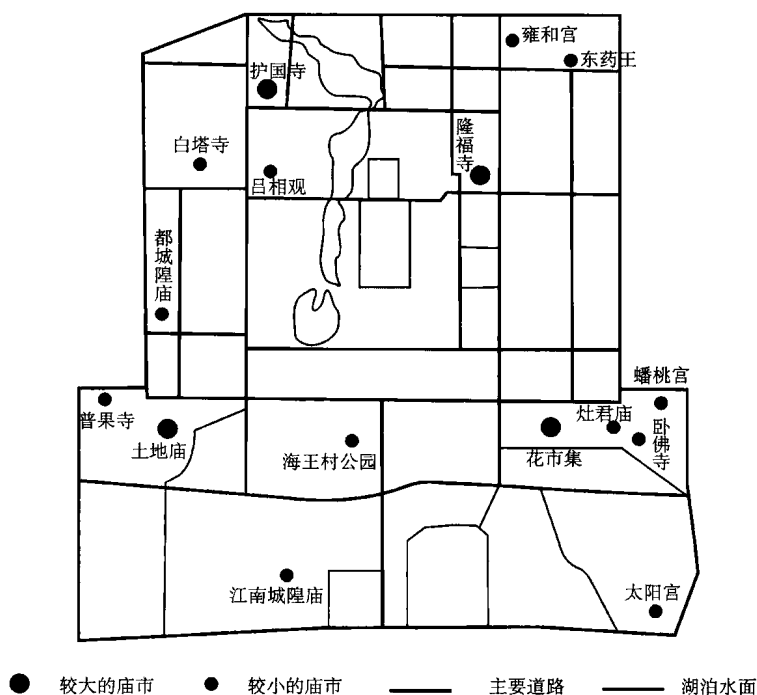


图1 民国年间北京市内庙市分布图^①

① 本文插入的北京城市和庙市位置图均根据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市历史地图集》（1985年版第69—70页）一集绘制。

2. 民国年间北京庙市商业的时间和地域结构分析

为了理解民国时期庙市在北京市市场结构中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地了解当时庙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组合特点。

1) 庙市的时间结构

根据民国 26 年北平民国学院所做的《北平庙会调查》，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土地庙和花市集等五大庙会都是每月开市三次，全年开市日期都在 36 天以上（图 2）^①。

从开市日数上看，北京各主要庙市除了东岳庙外，五大庙市的开市日期均较其余庙市多。商业强度在某种程度上与开市日期有正相关的关系，所以开市日期可以反映庙市规模等级。五大庙市全年开市日数最多，所以地位也最为重要，至于东岳庙则处于城外，其周围的人口密度较城内低，市场需求也较小，所以东岳庙没有成为人们印象中的五大庙会。

从各个月份看，除去公历每月都开市的五大庙市和旧历每月都开市的 11 个庙市以外，只在年内个别月份开市的庙市分布图如图 3。

由图 3 可知年内庙市开市的时程有这样的分布特点：一月庙市最多，从二至四月庙市数目有增多的趋势，四月以后庙市数又逐渐减少，到了 11、12 两月则只有常年开市的那些庙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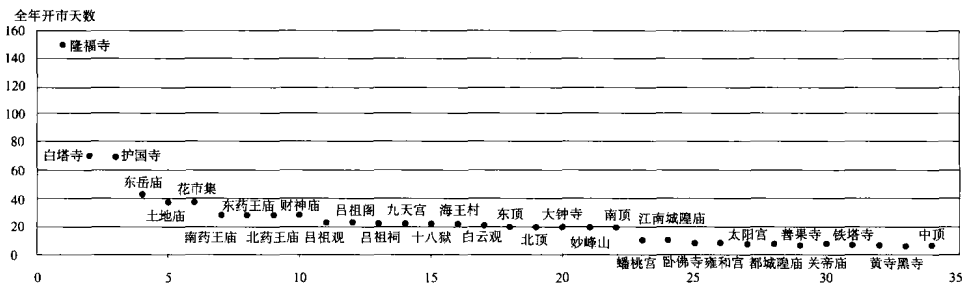


图 2 民国年间北京庙会的时间分布

① 本图根据《北平庙会调查》整理得，其中由于关帝庙开市日期年际差别较大（27—42 天），没有可比性，所以剔除该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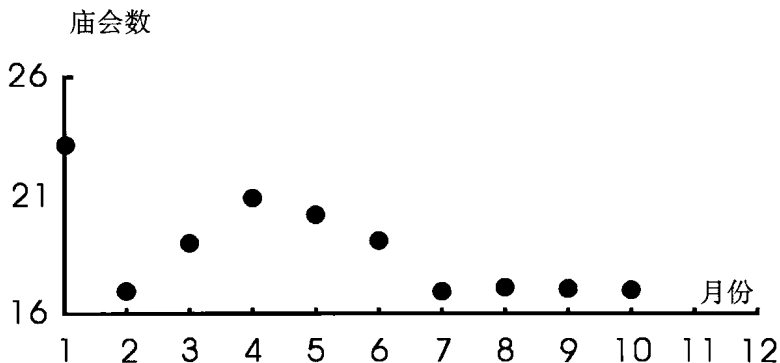


图3 各月庙市分布

形成庙市这样时程分布是有其原因的。首先庙会的兴起都是与庙观的宗教活动或民间传统习俗有关的。一月份是中国传统和宗教节日最多的月份，所以正月里有很多庙会^①。11、12两月庙市较少的原因也与传统和宗教上节日较少有关，中国2000多年的小农经济，人们在11、12月时正是修养生息的时候，经济和宗教活动都比较少。二至四月庙市增多是庙会的另一种功能所至，就是所谓的“借佛游春”，这个时期正是仲春之际，而我们考察四月的庙会如北顶、西顶、东顶和铁塔寺都在郊外，正是人们春游的佳处，所以可以认为此处造成庙市年度分配不均衡的原因是人们郊游的需要，而不是商业的需求所至。

分析北京市各个庙市全年开市时间的分布和在各月的分配规律，我们不难发现各个庙市是有其等级规模差异的，同时庙市的商业强度全年差别并不很大。36个庙市中有16个是在一年中平均开市的，各个月间庙市开市有差异的多是郊区或者影响较小的。所以民国时期北京市的庙市在城市中形成了有一定等级的商业结构，并且这种结构在时间上是较为稳定的。

2) 庙市的地域结构

北京市的庙市在城内各个区的分布见表1。

^① 图3中所计算的1月份庙会数是用国历一月和旧历正月数据的加和，因为两种计时方式有差别但是往往会有大部分重合，而且按国历一月开市的庙市只有海王村公园1处，将它并入旧历正月不会产生太大的误差。

表1 城内各区庙市分布

城区	庙会数	庙会名称
内一区	0	
内二区	2	吕祖阁、都城隍庙
内三区	3	雍和宫、东药王庙、隆福寺
内四区	3	吕祖观、白塔寺、护国寺
内五区	1	北药王庙
外一区	0	
外二区	2	吕祖祠、海王村公园
外三区	5	灶君庙、卧佛寺、蟠桃宫、太阳宫、花市集
外四区	2	善果寺、土地庙
外五区	2	江南城隍庙、南药王庙

我们不难发现城内所开的庙市多是全年每月开市的商业强度较大的庙观。以中南海瀛台为中心，五大庙市都分布在距其五里的圆周上，而这个圆周之中没有其他的庙市。显然在这五大庙市的围合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庙市真空区。这是北京市庙市一个显著的地域结构特点。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将在后文述及。

3. 民国年间北京庙市所形成的商业结构及其形成原因

为了进一步了解北京市庙市所形成的商业结构，本文重点考察五大庙市和前面开市日期较多的东岳庙与新建的海王村公园，并将它们的分布与城市中既有的常年市场相结合研究。

细致地研究这些较大庙市的商业强度就不能只采用开市日期这一个指标了。表2中给出了这七个庙市开市的几项数据，包括庙会所在城区、全年集会次数、集会日数、集会面积和集会时商摊数目总计。

庙会的实际商业规模基本上可以用上表中集会日数、集会面积和集会商摊总计来表示，规模排序结果见表3。